

或作为传统学科研究可持续发展的新的增长点,都为民族文学、民间文学的可持续发展助力。中国知网显示,近些年把神话作为选题的学术论文,特别是研究生毕业论文呈现出递增趋势,研究群体的培育为神话学学科的发展奠定基础的同时,也为民族文学、民间文学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有学者强调,“神话学的建立,从某种意义上讲,又具有很强的实践性。”<sup>[8](P643~651)]</sup>这种实践性又与民族文学、民间文学的特征与发展需要是高度一致的。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就是来源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发展于民间,只有与人民群众精神需求相一致,才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发挥出积极的文化功能。无论是神话学建设自觉与民族文学、民间文学相结合,还是民族文学、民间文学学科建设中积极关注神话学成果,都是相互促进的有效路径,顺应了新时代多学科融合发展的新趋势。

#### 参考文献:

-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 [2]袁珂.再论广义神话[J].民间文学论坛,1984(3).
- [3]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求是,2023(17).
- [4]叶舒宪.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 [5]马学良,梁庭望,张公瑾.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
- [6]叶舒宪.物证优先:四重证据法与“玉成中国三部曲”[J].国际比较文学(中英文),2020(3).
- [7]李子贤.活形态神话研究与中国神话学建构[J].民间文化论坛,2010(3).
- [8]张振犁.中原神话考察述评[A].马昌仪.中国神话学百年文论选(下)[C].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3.

特约编辑 孙正国

责任编辑 强 琛 E-mail:qiangchen42@163.com

## 神话学与国学研究范式的更新

唐启翠

(上海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240)

**摘 要:**20 世纪国学研究新方向开拓和范式更新换代中,超学科的神话学是重要的学术驱动力之一。从历时性视角来回看,其大致经历了神话作为新学问、新理论,神话作为方法和神话作为资源三阶段的发展。神话学渐渐成为一种新的用以观察和解释人类文化遗产、社会记忆、历史书写、文化认同等理论视阈。而中国文学人类学派则通过神话观念的更新、神话载体的开拓和研究方法的革新,在国学研究园地种植了一片新林,成为新文科理念的先驱性实践者。

**关键词:**神话学;国学;文学人类学;研究范式

**分类号:**B9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2024)06-0004-04

2024 年 1 月,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评议组编写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基本要求》(试行版)公开发布,其中的新动向有:消失 27 年的“民

间文学”重回二级学科目录,而在这 27 年里承担了民间文学部分研究工作的“文学人类学”<sup>①</sup>,作为交叉学科首次出现在学科目录上,隶属于二级学科文

收稿日期:2024-08-22

作者简介:唐启翠(1975-),女,湖北襄阳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文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礼制与神话、玉文化研究。

① 1997 年,学科目录取消民间文学,分化到中国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和民俗学。民间文学主要研究对象是民众以口头方式创作、流播、传承的文学,分支学科包括神话学、故事学、传说学、歌谣学、史诗学等。1996 年,中国比较文学文学人类学研究分会成立,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研究(神话与艺术)、中国多民族文学协同研究、中国宝卷整理与研究、《格萨尔》文献辑录及中国口头文学遗产数字化工程·神话卷等方面有效承担了民间文学的学科功能。详参叶舒宪 2024 年 4 月 13 日在福州“跨文化交际·文学人类学与译介研究”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文学科目录更新与文学人类学的未来”。

艺学：着眼于文学与人类的一般活动或其他活动关系的研究方向之一。<sup>①</sup>作为一个学术词汇或学术研究新方向，“文学人类学”1978 年首次正式出现在伊瑟尔的论文《走向文学人类学》中，但其奠基性研究却可以追溯到剑桥学派的神话—仪式研究如弗雷泽《金枝》、哈里森《古代艺术与仪式》和弗莱的文学整体关系研究。中国文学人类学紧随国际文学研究新动向，逐步完成了从译介、整合到本土理论方法的实践与创新。<sup>②</sup>文学人类学是文学与人类学相遇、碰撞与交叉融合诞生的新学科，而神话学则是文学与人类学交流对话的关键桥梁。在中国文学人类学发展历程中，国学研究的新方向和范式变革，很重要的一个学术驱动力就是神话学。若从神话学作为一门学科知识在国学园地的萌芽算起，从历时性视角来回看，其大致经历了神话作为新学问、新理论，神话作为新方法和神话作为资源三阶段的发展。而中国文学人类学派则通过神话观念的更新、神话载体的开拓和研究方法的革新，在国学研究园地种植了一片新林，成为新文科理念的先驱性实践者。

## 一、神话作为新学问：从译介整理到本土化研究

晚清社会急剧变革，文化及其学术转型之际，“神话”作为新术语、新学问进入中国学术视野，成为文学、史学重新思考中华民族现实命运，建构民族精神和学术生长点的新秀。神话最早究竟何时进入中国？缘何归于文学学科？许多学者做了学术梳理和批判性反思<sup>③</sup>，其基本共识是：1903 年留日学生蒋观云的《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一文首次将日语“しんわ”音译（Shinwa）“神话”一词译介进中国，赋予乾嘉学派以为荒诞不足道的神怪以新的意义——“鼓荡”人心“有力”的文学。谭佳在其《神话与古史》中则从晚明西学东渐后融入儒学的策略及其分科认知，和“神话”的本土意义及其文体归属于文学学科的原因，将“神话”一词首次出现的时间前溯到 1897

年 12 月 4 日《实学报》所载孙福保所译《非尼西亚国史》。而真正对国学研究产生奠基作用的是 1897～1900 年间章太炎的论著《清儒》“上古以史为天官，其记录有近于神话”，和《哀清史》“上世瞽史巫祝，事守相近；保章、灵台，亦官联也，故作史必详神话”。章太炎以神话新词奠定了六经皆史的学理基础和“神话—古史”研究范式，直接从内容和形式上形塑了 21 世纪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话语模式<sup>[1](P3)</sup>，同时也开启了神话与信史对立范式。此后经由夏曾佑、谢六逸、古史辨派（顾颉刚、杨宽、童书业等），神话与古史走向完全分化与对立。关于神话与历史的关系，谭佳在其《神话与古史》中曾梳理过三位颇具学术影响力学者的探索：考古学家张光直“历史是神话”、神话学家叶舒宪“神话历史”和人类学家王明珂“神话是历史”与“历史心性”说。张光直的商周神话研究有很强的理论自觉和商周历史语境及其文化结构的限定性。王明珂虽师承张光直，却又另辟蹊径，从移动田野、人类生态、文本叙事等视角，将历史和神话置于同等层面，重新梳理和思考了三千余年来广泛流传于中国及其周边的诸多“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故事”书写与讲述的历史情境、情感和意图等潜在的“历史心性”，神话即历史，二者相互发酵，改变对方，形塑人们的观念和记忆。叶舒宪以玉为核心的中国神话研究，旨在探寻文明起源、形成期，玉石在东亚物质文化、精神信仰和工艺技术等方面的普遍认同和传播，如何超越地域和族群界限，促成中华文化从多元走向一体，并形成一整套以祭祀礼乐为核心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成为中华文化认同的物质原型。神话与历史在此似乎消弭了间隙，而凝结为一词“mythistory”——文明的发生、历史的表述或书写必伴随着神话，神话是信仰、智慧、策略、资源的统一体。在此，“神话即历史”和“神话历史”说，旗帜鲜明地打破了神话与历史对立的僵局；并以文化整体观和比较神话学视野，重新开启新一代学者对《春秋》《论语》《周礼》《仪礼》《礼记》《管子》《墨子》《淮南子》

① 详参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官网，<https://www.acge.org.cn/encyclopediaFront/enterEncyclopediaIndex>。

② 关于文学人类学的发展及其理论方法的本土实践与创新，详参谭佳《整合与创新：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七十年》，《中国文学评论》2019 年第 3 期。

③ 代表性的如马昌仪《中国神话学发展的一个轮廓》（1994），叶舒宪《神话学的兴起及其东渐》（1996），《中国神话学百年回眸》（2005），《神话的超前智慧》（2005），贺学军《中国神话研究百年》（2000），高有鹏《中国神话研究的世纪回眸》（2008）等。

等早期经典文本叙事的神话编码模式的深入探究。<sup>[2]</sup>2010 年光明日报出版社推出“神话历史丛书”第一辑,就是青年一代学者对“神话历史”的自觉体认与研究实践。“在全新的‘神话历史’视野下,巫史的神圣诉求和现实的王权话语成为了中国历史叙事的起源和发展线索”,神话作为曾经的信仰根基、思维模式和文化编码,弥漫在中华文明经纬脉络和古代典籍的叙事底层。<sup>[3]</sup>而将神话与历史均视作一种社会记忆,强调两个范畴基于族群认同的建构性质,丰富了“神话历史”的内涵。

与神话—古史研究同时的,还有神话故事、神话—仪式和神话图像的译介与本土化研究实践。茅盾《北欧神话 ABC》(1930)、周作人译作《红星佚史》《希腊神话》《希腊的神与英雄》等,将欧洲神话译介进中国。鲁迅《破恶声论》《中国小说史略》(1924)率先论及中国神话与传说、宗教的关系以及神话在文学中的源头地位。而现代中国神话研究的开山之作《中国神话研究 ABC》(署名玄珠即茅盾,1928)借鉴 19 世纪下半叶英国人类学派神话学的理念和方法,梳理、研究中国上古神话“断片”的基础上,提出“中国神话历史化”命题,重构中国创世神话叙事谱系和原始先民的神话宇宙观,成为中国现代神话学的基石。<sup>[4]</sup>系统化整理中国神话资料,提出并论证广义神话概念,扩展了神话学研究的视野和领域的则是袁珂,其《古代中国神话》是我国第一部较系统的汉民族古代神话专著,而其编选的《中国神话选》《神话选译百题》《神话论文集》《中国神话传说》《中国神话传说词典》《山海经校注》《山海经校译》《中国神话资料萃编》等,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和理论基础。神话仪式理论的译介与研究,如法国汉学家葛兰言和中国学者闻一多援引神话仪式新视野研究《诗经》,在礼野双向互动中重构上古节庆礼仪及其神话信仰基础。郑振铎运用弗雷泽《金枝》中祭司王祭祀原理,研究复原《汤祷篇》中的神圣仪式情境。凌纯声用比较神话学和考古人类学视野研究、还原《国殇》《礼魂》与觴首祭泉仪式的关系。闻一多的弟子孙作云以古物、古俗研究中国古代图腾,是神话图像研究的滥觞。而 20 世纪后半叶以降,叶舒宪《中国神话哲学》《诗经的文化阐释》、萧兵《楚辞与神话》《楚辞的文化破译》《雉蜡之风》、徐新建《西南研究论》《民歌与国学》、彭兆荣《人类学仪式的理论与实践》《文学与仪式》,等等,皆以更为广阔的视野,从文

化人类学视角,对神话—仪式理论进行全面系统的译介评述,和本土化案例研究与理论创新相整合。

从首代学者筚路蓝缕的译介研究、搜集整理到第二、第三、第四代学者孜孜以求的探索,神话从一种新学问,渐渐变成一种新的用以观察和解释人类文化遗产(包括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实物与图像等)和社会行为的理论视阈。

## 二、神话作为方法:从原型、结构到四重证据法

若说神话作为理论视阈提供了一个宏观的重新观察和阐释社会文化的理论框架,那么,神话作为方法,则更侧重指其实践操作性和跨学科的创造性探索——一种可将神话理论视阈具体落实在研究对象上的实操技能。理论视阈和方法其实一体两面。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由叶舒宪译介的《神话—原型批评》《结构主义神话学》《活着的女神》《萨满之声》等,为中国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民间文学、神话学等研究提供了丰富且可以指引实操技能的理论与方法论资源。其《中国神话哲学》兼具神话原型、神话仪式和结构主义神话学等理论方法,开拓性地重构了中国神话元宇宙;对中国文化系统生成转换规则的内在思维模式和神话原型的构拟,深刻影响了几代学人。萧兵、叶舒宪、王子今、臧克和、梅新林、吕微等,运用文化人类学、考古学、文字学、心理学、神话学、现象学等跨学科阐释视野,对中国典籍《论语》《老子》《庄子》《山海经》《史记》《说文解字》《红楼梦》、鲧禹神话等进行的比较神话学阐释,实例呼应神话—仪式理论的跨文化阐释效力和神话原型、结构主义神话学作为方法论的意义,影响甚大,泽被后世,对认识和发掘潜藏在中国早期经典文本叙事深层的文化编码具有示范意义,为后来的“神话历史丛书”“文学人类学原创书系”“神话学文库”以及大小文化传统论、文化文本论等奠定了基本的研究范式。

20 世纪以来,民俗学、考古学与人类学相继在中国学界开启了眼光向下、眼光向前和眼光向外的视阈革命,极大冲击了原有的知识结构和治学方法。在古史与古代典籍研究领域,逐渐打破传统经典文献考据学一枝独秀的研究局面,渐次引入出土文献(主要为甲金文字)、实地调查的口传文献和考古发现的实物遗存与图像等。如孙作云提出的古史和神话研究要取证于书本、古物和古俗的“三层证明法”,



饶宗颐在王国维“二重证据法”基础上提出的书写文献、出土文献、考古遗物、民族学资料和异邦古史资料“五重证据法”，最终经叶舒宪研究提炼总结为人文学“四重证据法”<sup>[5,6]</sup>及其间性互补的操作模型：“文化大小传统论”（2010）、“N 级编码论”（2012）和“文化文本论”（2013）。一重传世文献与二重出土文献（文）、三重口传神话和活态仪式（言、行）和四重考古出土实物物象与图像（象），皆是神话观念寄寓的物化符号载体，或曰由显性符号构成的可视化文本形态，而考古出土的遗存遗物及图像、口传神话与仪式展演等，则是早于文字文本小传统产生时代的文化大传统，对文字文本小传统具有孕育和形塑功能；从文化大传统（文化文本）到文化小传统（文学文本），是一个连续的非线性的多维编码过程；四重证据及其间性互补是文学文本与文化文本对话和立体重建神话意象或神话观念语境的重要途径。而“神话历史”则是新时代重新贯通文史哲诸学科整合优势的概念武器，也是文化文本多元符号编码背后隐蔽的思维法则。因此，上述系列术语不断延展表述的背后，是中国文学人类学神话研究对象、理论与方法逐渐清晰的过程，也是逐渐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立的过程。2015 年《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视角》、2021 年《文化文本》理论专刊的相继推出，则是神话作为理论视阈和方法介入中华文明探源研究的产物。研究者试图从比较神话学的文明比较视角，探索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瓶颈难题；五千年文明仅有三千年的文本，如何凭借非文字符号的解码，实现万年中国史前神话信仰与五千年文明国家意识形态发生的全程衔接研究？<sup>[7]</sup>作为第四重证据的物证之小心求证，使得神话历史脉络一直延伸到上五千年时段，大大超过了国人通常所说的五千年文明，这势必将研究者引向更多学科的交叉融合新方向。四重证据法实现了学科交叉与知识创新的整合，拓展了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范式。2024 年 9 月底，在四川美术学院举办的第三届艺术遗产国际论坛的主题之一，就是将“神话作为方法”介入艺术遗产研究。

三、神话作为资源：从创意书写到数智人文

神话是人类最重要的文化基因之一，携带着创述者的思维方式、情感好恶和社会生活的密码原型。神话在理论视阈和方法之外，亦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经久不衰的创意之源，在创述族群的礼仪生活、秩序

重建、价值重塑、生态平衡、制器作文等活动中发挥着原型形塑和社会宪章功能。文学是置换变形的神话。史前信仰语境下的器物又何尝不是物化的神话存续形态？在某种意义上，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创意的绝妙践行史。因为人是充满想象性的符号动物，能以创意想象将观念符号化和物化，将人类内在幻象、无形观念负载在物象、仪式景观中，呈现于外部现实世界，并巧借不同时代的流行媒介物（器物、仪式、典籍、景观、影像、短视频等），使其得以穿越历史的罅隙，不断革故鼎新地重现于世人面前。在此意义上，神话从来就是“不同时代语境下，各类文本或媒介形式交汇互动中不断动态生成的叙事过程”，是“神话不断穿越时间的屏障，从古至今触动人心的奥秘所在”<sup>[8]</sup>。

在当下数字时代，电子媒介俨然已成为神话“双创”的重要载体和神话传播与接受的主要途径，在援引、融汇和重铸三种神话重述的创编方式中，小说＋影视改编者更青睐重铸传统，即援引、融汇传统神话文本中的人物、主题、圣物、仪式、情节/情结等要素，在新的宇宙观、价值观和叙事结构中，创设新的神话故事、人物形象以及推动情节发展的圣物法器、仪式景观等。尤其是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今天，无论是文明起源期的神话物象、仪式遗存，还是经典文献里的神话意象、神话主题、神话情节、神话人物，都被作为创意资本重新赋予新生命，成为当代社会生活秩序、价值观传递和跨文明对话交流的重要途径。国学研究园地又将迎来数智人文时代的范式革命，且拭目以待。

参考文献：

[1] 谭佳. 神话与古史[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2] 叶舒宪. 中国的神话历史——从“中国神话”到“神话中国”[J]. 百色学院学报, 2009(1).  
[3] 李人凡.《神话历史丛书》的创新意义[N]. 中华读书报, 2011-11-09(20).  
[4] 刘锡诚. 茅盾与中国神话学[J].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1).  
[5] 叶舒宪. 文学人类学教程[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6] 杨骊, 等. 四重证据法研究[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9.  
[7] 叶舒宪. 考古中国: 玉成中国一万年[M]. 北京: 中信出版集团, 2024.  
[8] 杨利慧. 当代神话学的立场和追求: 在整体时间观和互文之网中重新理解神话和神话学[J]. 西北民族研究, 2023(4).

特约编辑 孙正国

责任编辑 强 琛 E-mail: qiangchen42@163.com